

废科举的历史反思

曾 华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废除科举是历史发展和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它促进了西方教育制度和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推动了传统学术的转型,使得新式知识分子得以形成。但也应看到,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打破权力垄断、促进社会公平和推动儒学的传承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理性总结科举制度的功过是非,对今天的教育发展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科举制度;废除科举;考试制度;人才选拔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121-05

Historical Thinking about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ZENG Hu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t promotes the western education system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be transported and developed in our countr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traditional academic, and forms the new intellectuals. Howev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layed important function in selecting talents, breaking power monopoly,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ism and so on. Rational summa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gives us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oday's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alent selection

科举学创始人刘海峰教授指出:科举这种选才形式虽已被废,但其精神内核却至今还影响社会和教育发展,现代高考就被视为古代科举的现代形态,其它各种考试及国外的文官考试制度也或多或少借鉴了科举。^[1]由此可见,科举制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在社会与历史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影响长达千年之久。就如同知识一样,知识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其内容变化万千,但它的实质终究是为人类文明贡献力量,而这种影响随时间流逝会越来越明显^[2]。科举制既是一种选才制度,也是一种教育制度。现今许多学者对科举制的教育意义有不少负面评价,认为科举束缚了学子们追求知识多样性的能力,将他们的学习范围牢牢地局限于四书五经之中。更有甚者认为,不少中小学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就是深受到古代科举制的毒害。但是经过理性地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科举制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它有缺点但绝对不是一无是处。

自实施科举制度以来,读书人的地位迅速改变,他们一方面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对文化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在现代中国,尊重读书人,向往大学生活,将考上大学看成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

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广大考生特别是农村学子为之努力的梦想。但我们同样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就科举而论科举,正如胡适所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客观公正地评价科举才是研究者应尽的职责。一味地歌颂科举与盲目地否定科举,从来都不是理性的决断。本文试图从科举制的发展历程、存在与消亡的原因进行反思,以期对科举进行再认识。

一、科举制的发展历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由积贫积弱趋于稳定,但农民收入依然有限,在农村供养孩子上学并非易事。笔者在求学期间,父母与亲戚、老师们就不断地灌输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实际上,在中小学课本中,因读书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正面的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映雪读书等,反面的如孔乙己、范进中举等,无不反映出即使是统治阶级,他们对读书影响个人也深信不疑。政府办学的前提,无不是以追求社会稳定为目的,个人接受文化教育,社会才能稳定,文明才能不断繁衍。正是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个人在求学过程中,完成了对生命

收稿日期:2012-08-09

作者简介:曾华(1985—),男,湖北荆州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运的改变。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即财富。

古代读书与个人命运转变最具相关性的只有科举。因此,科举案例不断入选教材,这证明了科举无论是作为正面还是反面的形象,其存在价值无疑。科举制不论诞生于何时,它的出现绝非偶然现象或者是为政者灵光一现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荐举、察举征辟制与九品中正制为何只在实行很短的时间后就被科举制所取代,并且这一取代就是1300多年,值得深思。

荐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首重的是德行才能而非家庭背景与家族影响,这打破了传统的世袭与家国观念,为政府机制的防腐败与继续正常运转注入了动力。随后西汉出现的察举征辟制则是荐举制成熟的重要标志。察举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或地方推荐官吏的制度。很显然,察举比荐举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其权威性大大增强。科举制在很大程度上借取了察举的经验成份,如察举的支持者、察举的类别、察举的形式皆影响了随后出现的科举。察举中的诏举即为科举中的制举,是政府专为选拔特殊人才而设。察举的对策也成为科举选才的一种重要考试方式。但很可惜的是,察举这样一种本来很好的选才制度,因为政府后期的腐败无能,以及官员结党营私与专权,使得其最后成为一种虚假存在的制度,而国家考试制度一旦没落,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考试制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无论在哪一个朝代皆是如此。

曹魏时,魏王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来为国家选拔人才。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负责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并博采众家之建议,从上至下分九等品评地方士人,供朝廷按品级授官。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发展,它将选官权由地方收归中央,人分九等在人才学分类上是一种创新,选才标准趋于周密。魏、晋时期由于门阀统治的加强,在东晋以后此选才制度的弊端渐显,中正权重,品评随意,世族门阀把持中正,控制选举,至后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九品中正制”已成为门阀统治的工具。九品中正制的命运,如同它之前的察举制一样,由于政府的无能而导致其灭亡。究竟如何建立一种长效的考试选才制度,保证其为政府与社会服务?如果是政府自身的问题,那么无论什么样的考试制度,肯定也都无法长存下去。但如果是考试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肯定会有一种制度符合政府的要求。于是,科举制承载着太多人的(不仅是官员,还有普通大众)梦想顺时势而出现了。

科举制是国家的抡才大典,这说明它的政治性十分明显,即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以便更好地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从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但政治性的目的,往往并不是单一的,政治本身就是一

个充满丰富含义的概念,它与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联。对政府而言,科举的重要性往往没有普通百姓所体现的更为明显。因为政府可以随时更换它认为不合理的选才制度,而普通百姓却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只能适应政府而无法改变政府的决定。所以为什么在随后存在的1300多年里,科举成了无数普通士子为之魂牵梦绕甚至付诸一生的对象,因为在他们心中,科举的神圣性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刘海峰教授在其代表作《科举学导论》中专设一章,名为“科举社会论”。他认为,无论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的流动,还是从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方面来看,科举制的影响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1]。而从钱穆提出的“科举社会”出发,后又有学者提出了“考试社会”,科举的考试性质就成为科举政治性的有力保障。可以说,科举之所以能够长存,不在于它是官方所定的考试选拔制度,而在于它是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唯一桥梁。从诸多古人诗词与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科举制的魅力:很多人因科举而大富大贵、官运亨通,也有很多人因科举而家财散尽、穷困潦倒。科举考试中,各种年龄段的人皆有,80以上的老翁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很平常的现象。无论考中还是没有考中,几乎没有人去否定科举制度本身,而更多的只是叹自身命运与实力不济。只要科举一日不废,他们就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科举考试之中去,直到实现自己金榜题名的理想为止。由科举而带动的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科举制的巨大影响。

科举制的内涵表明,它基本上遵从的是儒家传统重平等的观念。儒家思想延续两千多年至今依然显示很强的生命力,证明了科举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是一种完美的互补。儒家在意识到人有差别时主张人格上的平等^{[3]122},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格的平等重在对个体的尊重,与人的家庭环境以及拥有的财富地位无关。这也是儒家的本质特征。古代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之所以能够和平共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儒家的人格平等主张而循。人格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气质,非财富与地位所能给予。当然,部分人愿意为了自己的仕途而贱卖人格,则另当别论,此种人非为儒家所说君子也。在科举文化与科考内容上,体现儒家思想最为明显。传统的四书五经为必考科目,在宋以后的科考中更是发展到极致。儒家讲究人人平等的观念,则体现于中举后士子心态。只有科举才能让人相信,通过努力照样可以获得极高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同时也有一些人更很享受科考过程带来的喜悦。在科考盛行的时代,有人即使不经过科考而依家势获得了一切,他们依然会失落,因为他们没有科名,这可能成为他们在社会活动中难以抹去的伤口。

二、科举停废

有学者指出:上世纪的中国,以改革始,以改革终^[4]。上世纪初最重要的改革即清末新政,而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即停废科举、兴学堂。何以清政府会将本来最值得其信任的选才制度废除掉呢?除了一般所认为的“科举流弊日久”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清政府已经意识到科举制对自己统治再无多大作用。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政府首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只有从自身利益出发,才能够保证统治地位的稳固。那么科举制为什么会到了非废止不可的地步呢?

首先,科举制与西方知识的接轨出现了巨大冲突。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并且演变到明代后期更是成为一种刻板的教条,对人的身心发展不但没有多大益处,反而成为一种摧残人性的考试制度。从现代知识的分野来看,科考内容首重的乃是人文社会科识,对自然科学知识虽也有涉列,但特别少,并且处于极为肤浅的水平。自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端,科技水平便决定了一国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一国在国际上的争霸水平。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甲午海战的失败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已提出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早期维新派强烈要求进行知识的西化,以此来维护清政府已经岌岌可危的统治。康有为更是在公车上书中明确提出废科举的主张。当科考的内容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考试需要之时,废科举便成为必然的选择。但究竟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或者是全盘西化,这些都是统治者内部之间的争论。科举制的废止,只是把有志之士的眼光放到了更为先进的西方知识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否真的心甘情愿地接受科举制被废的事实,就不得而知。也许在他们看来,其地位的获得跟科举制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科举,就没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其次,科举制已经无力选拔出优秀人才来挽救国家的衰亡。随着西学的不断引入,西方科学技术在国内的影响日益加深,政府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不论在工业界、企业界还是在教育界,新式的科技人才都成为抢手货与必需品,而靠科举考试来选拔此类人才则是虚妄。当一大批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终究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事实时,他们也不得不同时接受西学的洗礼,尽管这是一种很无奈的选择。在20世纪初期,清政府尝试性地派出人去欧美学习,取得的效果很明显,接着又派大批幼童留美,虽然无疾而终,但给清政府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一批留欧留美的学生,在归国后都成为独挡一面的人物,为当时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清政府更是将这批在欧美取得学位的学生授予科名,可见西学对中国的巨大影响。科举制在完成它的既定使命之后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最后,政府与有志之士的争论与政府之间的内斗成为科举被废的重要因素。林乐知认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1]他明确指出废科举乃是中国振兴的必由之路。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则采用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来变向废科举。他们在1901年和1902年初向清政府呈交的“江汉三奏”中,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在科举考试中增加“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的内容^[5],并建议清政府奖励科名给那些归国人员。清政府很快接受了这种改革思路,并且逐渐推行开来。实际上张之洞与刘坤一等人对科举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不是急风暴雨式的。因为他们也看到如果采用武断式的废科举,必然造成政府与社会的激烈动荡,而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可能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最后崩塌。所以,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在内心的挣扎中开始废科举的。

废科举的激进派以袁世凯和端方为首。他们认为,科举如若一日不废,那世人皆有侥幸获第之心,这对于培养新式人才是极为不利的。这一建议随后被清政府采纳。仔细分析袁端二人的奏折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建议之所以能够被采纳吸收,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他们看到了新式学堂的积极作用。新式学堂对培养清政府所急需科技的人才最为有用,如果科举不废,那么新式学堂永远无法得到有效推广。清政府此时也意识到新式学堂对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巨大作用,于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但是不得不指出,袁端二人的这种走钢丝的做法是冒有极大风险的。要想使人们摆脱对科举的依赖,在短时间是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科举之变如刘海峰教授所言“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如身上每个器官一样,一个器官受损,其他器官及整个身体都会受到影响。况且科举制维系的不仅仅是政府体制,而是整个国民体制。泱泱大国皆受科举制影响,知识精英阶层最为依赖的也是科举,当还没有做好准备对科举说再见时,突然的废科举必然对他们的内心造成严重打击。萧功秦教授指出,以这样的方式革科举的命,那么一大批失落的知识分子或是游离的知识分子就会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如严复所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如何保证在废科举前让社会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期是政府与精英阶层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显然清政府并没有考虑成熟。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旧的体制未全部消除,而新的体制又无法建立。

三、废科举后的社会效应

关于废科后的社会效应,不同的利益群体争论得十分激烈。力主废科举一派认为废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面貌,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变革,而维护

科举一派则认为废科举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终止科举制的行动,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显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6]由此可见,废科举后的社会影响,很难用绝对的话语来定论,而是要辩证地看待。

首先,废科举促进了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建立起来。自19世纪60年代始,清政府陆续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内容涉及语言、军事、科技等各个方面,种类繁多,规模巨大。特别是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表明中国认可了西方现代大学制度,这对以后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到1905年时,中国的新式学堂达到了8277所,显示出废科举后中国接受西式教育的程度之深、速度之快。但凡事皆有两面性,欲速则不达。清政府在准备开办学堂时,太过贪求速度而忽视办学的基本规律,贪多而不求精,这造成学堂在创办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办学经费不足、师资力量有限、内部管理体制存在隐患。经历战争洗礼的清政府财力有限,而开办新式学堂又需要大量的资金,单凭财政拨款根本无法满足办学所需。中央财政有限,地方政府财力也严重不足,很多省立学堂因为经费不足,最后只好关门大吉。师资力量的匮乏也是新式学堂无以为继的重要原因。学校开设课程多引进西学,而懂西学的教师却很少,并且这些教师具有流动性,可以在不同的学校进行教学,导致每所学校的师资队伍也不尽稳定。再者,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在管理人员队伍上,多数皆平庸无能之辈,且为官绅所控制。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去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反而经常欺压学生。难怪梁启超在1915年颇有感慨地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其次,废科举促进了现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及传统学术的转型,但程度有限。自魏源提出“师以长技以制夷”始,中国对现代科技的引进慢慢成为主流。洋务派通过开办学堂、翻译西学著作、开办军工企业,对西方科技的引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尤其是开办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与军事人才,有效地满足了当时社会需要,同时现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也逐渐形成。未废科举前,传统的知识结构是以四部之学为主体,即经、史、子、集,而废科举后,随着西学的引入,传统的四部之学开始走向现代西方的七科之学。西方完整的学科门类被介绍到国内之后,对大学学科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一词经日本转译入中国之后,自然科学渐渐成为中体西学框架下最为有力的学科主体。而后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更是通过学制规定,将自然科学课程化,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但正如前面所言,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之下,中体还是占主导地位。就连

清政府派去的留美幼童也必须从小习得中国传统文化与经典,特别是儒家那一套礼仪。当在异国他乡的境遇与在国内完全不一样时,留美幼童开始心生动摇,而这时清政府便迅速地中断留美计划,导致了中国对西学接受的不完全。

第三,科举停废使得新式知识分子得以形成,但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播与文化再生产的主体,是人类文明的使者。就中国而言,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传统士大夫重视功名利禄,是统治者最为依赖的对象。他们秉承“学优则仕”的理想,前仆后继地贡献着自己的一生。在西学东传以后,现代科技与人文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思想造成巨大冲击,很多人都放弃了以科举及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观念,转而接受现代西方思想的洗礼。在实践方面,主要以开办学堂,翻译外文书籍为主。据统计,新式学堂学生在1904年有近10万人,次年即增至近26万人,1906年科举废除后猛增至55万人,1907年复增至102万多人,人数连续翻番,到1909年高达近164万之众。留学生以留日者最众,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5年间,留日学生由200多人猛增至8000多人,废除科举后更增至12000多人。去美国和欧洲的留学生,在20世纪初也大幅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一二年,留美学生有650人,留欧学生约500余人。^[4]这些都使得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壮大。

但与此同时,科举被废也使得数以万计要参加科考的士员失去进身之阶,他们成为社会上的闲散人群。很多读书人因此加入各种社会组织,对清政府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萧功秦指出,科举被废之后造成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断裂,特别指出游离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少士绅在科举被废后,逐渐离开乡土,走进城市从政、求学或经商、且愈有才干者愈加如此。”^{[3]253}留在乡村的多为一些年老力衰的绅士,这就造成土豪劣绅逐渐兴起,乡村成为被文化精英遗弃的地方,从而加剧了地主与贫苦农民的矛盾,为日后的农民起义埋下了导火索。

鉴于科举被废后所引起的各种社会效应,不少人开始逐渐反思废科举的利与弊,对废科举提出各种质疑。很多学者认为“科举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梁启超也认为“科举非恶制也。”1907年给事中李灼华认为“科举可收拾人心”,并提出“科举与学堂并行”的策略。但种种声音都无力回天,科举被废已成既定事实。回望过去的1300多年,科举在完成它的既定使命之后,却没有获得一个公允的评价,实在有些遗憾。

四、理性反思科举制

刘海峰教授的《为科举制平反》和《为科举制平反并不等于否定废科举》发表后,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其主旨主要是重评科举制,还原其真实面貌,

纠正过去人们对科举制的片面认识。科举制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么坏,也不是一种恶制,而是一种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选才制度。他明确指出: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公务员考试无不是古代科举的现代形态。理性评价科举制,既是对科举制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社会发展负责。可以说,现代的考选制度如果想真正做到尽善尽美,真正选拔到所需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借鉴古代的科举制度。盲目地否定科举,无疑是一种认识的退步。正如某些没有深入研究高考的人,却盲目地批判高考、要废止高考一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笔者看来,科举制之所以长存1300多年,与它一贯遵循的原则密切关联,这就是始终以选才为目的且客观公正。

首先,科举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广大的平民百姓也有了晋升官场的希望。在遵守国家法令的前提之下,不论何种出身,不论拥有多少财产,只要你想报考,就可以报考。除王位以下的一切政治职务,均向举子开放。这种开放性与公正性,是在三科举制诞生之前所没有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庶民的考试积极性,也有利于政府选拔到优秀人才。实际上,虽然有研究者指出,科举制的这种开放也只是有限的开放,如对妇女就禁止其参加科考。其实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就有实施女科举的打算,但因为各种原因被迫放弃,这说明科举考试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女性,只是由于当时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无力实行。科举制的开放性与公正性,无疑有效地防止了结党营私与专权,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普通百姓通过科举,也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对考生与政府来说是一种双赢。

其次,科举制以考选才、以考促学,既促进了社会公平,又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首重公平,因而对考试管理方面极为严格细致。从报考人的审核,到出题、考试、阅卷、评卷、分配录取名额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发现有人考试舞弊,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判以极刑,这不仅对考生,而且对考官、评卷者也是极大的威慑。对考生与考官互相勾结的现象,一旦发现,严惩不贷。另外,科举制在究竟是分路取人还是凭才取人上,一直有较大争议。单靠凭才取人,往往忽视了落后地区的优秀考生,因此这也引起了司马光与欧阳修的分歧。司马光主张分路取人,各个地区必须有一定名额中榜,而欧阳修则主张凭才取人,分数由高到低依次录取。现代高考也有类似问题,如果凭才取人,那么北京、上海等地接受优质中等教育的学生,岂不是全部要上清华北大等名校?这并不是说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就一定比其他其区的考生优秀,而是应该注意各省份之

间的名额分配,保证其教育落后省份的考生利益。罗尔斯的观点就是争取最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这是对功利主义“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猛烈回击。科举的分路取人,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做出的选择,在当时情况下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

科举之风盛行,带动了古代书院与学校的发展。古代书院是无数举子投考学习的地方,各地的官学私学也慢慢兴盛,全国学风之盛可见一斑。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学校保持其独立性而不受政府控制,特别是在官学日盛而私学衰微的年代,学校如果被政府牢牢控制,就很可能造成学校自身发展的瓶颈。

第三,科举制促进了儒学的繁衍与传承。刘海峰教授指出,受科举考试注重儒学经典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全国读书人认真钻研经典的现象,各种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辅导著作层出不穷。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7]科举考试的内容,一直局限于儒家经典,这使得全国上下读书忙,特别是学习四书五经之风盛行,对四书五经的解读也成为无数学者为之一生的事业。儒家思想提倡的平等观、公正观、孝义、礼仪等,都影响着士人的举止与心态。这种外在的学习造成的内化现象,使得中国成为儒学大国与东亚文化圈中心,临近国家无不以中国为尊。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科举制,儒家思想绝不可能如此深入人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千百年间的实践证明,科举制对中国封建王朝而言远比其他选才制度更有效。科举制既满足了统治者的内在需求,也获得了广大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它的存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科举被废也是顺应历史潮流,而且其内核被现代考试制度所吸收并沿用。总之,理性地看待科举,深入地研究科举,还原科举的真正身份,给其一个公正的评判是广大科举研究者的责任所在。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 科举学导论[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3.
- [2] 巴里·艾伦. 知识与文明[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2.
- [3] 何怀宏. 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2.
- [4] 徐辉. 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7-34.
- [5] 萧功秦.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J]. 战略与管理,1996(4):11-17.
- [6] 李志茗. 科举制度之废除及其后果——兼析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4):56-62.
- [7] 刘海峰. 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13-19.